

● 陈嘉庚丛书

陈嘉庚 与 抗日战争

黄顺通 刘正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嘉庚丛书

陈嘉庚与抗日战争

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集美校友总会

编

黄顺通 刘正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年·福州

(闽)新登字 01 号

CHEN JIAGENG YU KANGRI ZHANZHENG

陈嘉庚与抗日战争

陈嘉庚丛书

黄顺通 刘正英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5 印张 2 插页 24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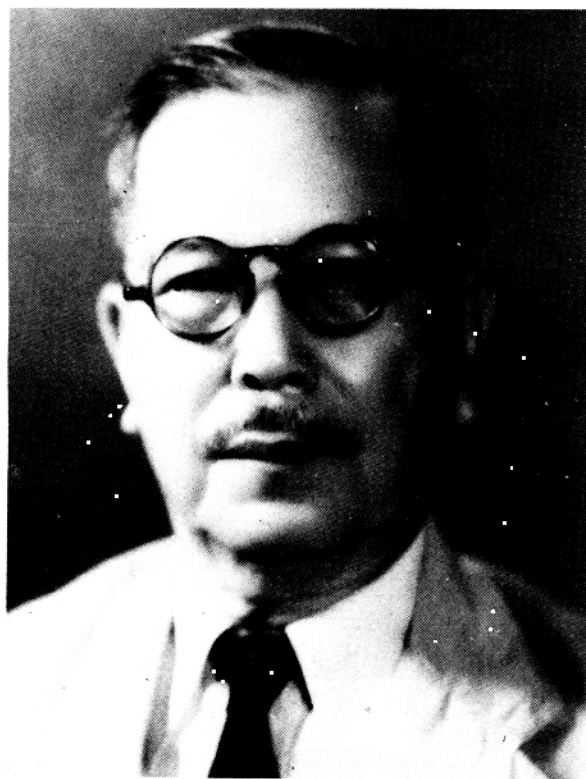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

林 洲 出 另

ISBN 7-211-02508-5

K·148 定价: 1.65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1950年陈嘉庚回国前夕摄于新加坡。

目 录

屈辱中形成的民族意识.....	(1)
受命于危难之际.....	(6)
关怀华侨技工	(15)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	(23)
炮火中归国慰问	(32)
保卫新加坡	(35)
为民族解放受无限苦辛	(41)

疾风知劲草，国难见英雄。陈嘉庚先生作为伟大的实业家、教育家，一向被后人所尊崇，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年代却是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在抗战爆发时他已是60多岁的花甲老人，但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绝不亚于任何一位对日作战功勋卓著的军事指挥家。

屈辱中形成的民族意识

嘉庚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国难深重的环境中度过的，很早就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自尊心。与他的出生地集美镇一水之隔的厦门，早在他出生前32年就因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而被迫辟为“五口通商”的一处口岸。他出生那一年，日本出兵台湾，清政府被迫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签定了为中国带来耻辱的《中日北京条约》。他十一二岁时，法国人进犯福州，中法两军在马尾进行了激烈的海战，结果却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他21岁时，腐败的清政府又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他在厦门亲眼看到沦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任由外国人耀武扬威，英美商人将一船船中国“猪仔”从厦门出港运往美洲，日本浪人在厦门横行霸道，神气活现。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统治下的家乡给陈嘉庚留下了痛苦的记忆。1906

年，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陈嘉庚经友人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由法国乘船回国途经新加坡，陈嘉庚与孙中山会面时，听孙先生说为了省钱，乘坐的是二等舱，立刻送给孙先生1万元做旅费。孙中山先生回国后，因为要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经济困难，急需费用，致电陈嘉庚求助，陈先生立即汇去5万元，这是他当时全部存款的1/8。此外，他还筹集巨款支持上海和家乡福建的革命政府。他的这些做法与后来的倾资办学一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邻日本对我中华大好河山窥伺已久，常存吞并中国之心。自甲午战争以来，得寸进尺，狼子野心日益猖獗，在军事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身在异邦心系祖国的陈嘉庚先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早在1928年日军侵占济南并杀死杀伤军民1万多人、造成“济南惨案”时，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义不容辞地担任筹赈会会长，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海外华侨慷慨捐助山东受害同胞，抵制日货。仅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募集到捐款30多万。在这次筹赈活动中，陈嘉庚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华侨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奠定了他在南洋华侨中的领导地位。

抗战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当地侨界著名人物叶玉堆、李俊承、陈延谦、周献瑞、李光前、陈六使等，一起到怡和轩俱乐部去见陈嘉庚，希望他出面领导新加坡华侨支援国内抗战。陈嘉庚认为，自己在商业上失败，已经没有财力，而华侨支援抗日主要是在财力方面，所以自己不适合担当领导责任，最好另推一位实力雄厚者出任领导。再者，中日关系如进一步恶化，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华侨援助抗战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相当的计划，不宜草率从事，而且要与居住地政府周旋，取得殖民当局允许，以便采取行动。叶玉堆等人一方面佩服嘉庚先生虑事的周全和深远，另一方面认为，嘉庚先生虽事业遭受挫折，但声望却比以前更高，况且南洋一带的实业家有很多是出自他的公司，或曾得到过他的帮助，只要他登高一呼，大家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只要新加坡率先行动起来，马来亚及南洋各地华侨也会积极响应。经过这一次侨界著名人士的劝说，陈嘉庚挺身而出，挑起了组织新加坡筹赈会的重担。为了确保援助抗日的工作顺利开展，嘉庚先生通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当地政府申请召开侨民大会，在征得英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同意后，总商会即发传单和登报通告，订于8月15日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大会前一天，华民政务司约见陈嘉庚，转达了总督的四点意见：（1）捐款以救济为目的，不

得表明筹款购买军火。(2)不得提议抵制日货。(3)款项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4)款项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8月15日,侨民大会按期举行,陈嘉庚被推举为大会临时主席,他在大会致辞中要求侨民遵守新加坡总督所提四条件,并阐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今日大会,到会诸君应当注意者有二:前者关系整个国家及民族,后者关系当地政府。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过去我国虽亡于元、亡于清,但我政权及教育尚在,文化保存,不至亡种。若观日本目前毒害中国,足知其旨在灭我种族,故意义特别重大。至于当地政府……极望各民族和洽,不致发生事端……本人所以不能不提出报告,实使列位知在居留地之行动,应格外审慎也。”他说:“平时人人言爱国,目前并无亲临前敌之必要,只是输款,是以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此次大会通过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规定委员32名,计闽帮9名,广帮4名,琼帮和客帮各两名,三江帮一名,委员由各帮自选,主席由委员会选出。第二天,筹赈委员会开会,陈嘉庚先生被选为筹赈会主席,筹赈会办事处就设在怡和轩俱乐部。这次会议征得捐款30万元。当地殖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抱中立立场,不允许政党活动,在限制以救济为目的的前提下,出于对陈嘉庚的信任,批准“星华筹赈会”为合法社

团。在 32 名委员的协力推动下，星华筹赈会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捐款的范围普及到全新加坡的华侨，捐款的形式除月捐、特别捐和大型娱乐场所每两三个月轮流举行一次的义赈之外，还有演戏、游艺、捐箱、卖花、卖物、报效、游海等募捐方式。星华筹赈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充分显示了新加坡侨胞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团结一致，与祖国人民共抗外侮的可贵精神，这使嘉庚先生深受感动，也为他今后进一步发动华侨支援抗日提供了经验。

1937 年 10 月，金门被日寇攻陷，菲律宾、马来亚等地闽侨纷纷组织救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尼侨领庄西言都向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者新加坡成立一个南洋华侨统一的筹赈机构，便于集中力量，统一行动，而陈嘉庚却以自己财力不足、威望不足而予以谢绝。但他认为马来亚各区，应派代表在吉隆坡举行一次“谈话研究会”。全马 12 个区派出代表 100 多人参加会议，推陈嘉庚先生为临时主席，并一致推举他担任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代表马来亚全体华侨与祖国中央政府联系，并与各区会及时互通消息。这样一来，陈嘉庚实际上由新加坡一地的筹赈会主席而扩大为全马来亚的筹赈会负责人。

这时，中央政府指定陈嘉庚等三名闽侨负责在星、马劝购救国公债 4000 万元。为使任务早日完成，陈嘉

庚建议再指定三名粤侨，并由全马 12 个区的筹赈会具体负责募购。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却电告中央政府说陈嘉庚不肯负责，准备另立机构，结果遭到殖民政府的拒绝。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思团结华侨，只想虚荣邀功的做法非常反感，但在国民政府委托星马筹赈会负责募购公债时，尽管星马华侨已经在前期大量捐款，仍然承担了劝募 2000 万元公债的任务，陈嘉庚自己带头认购 10 万元。他在写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先生的信中说：“金门失陷，厦集已成为最前线，此后厦大、集美两校将损失至如何程度，殊难逆料。然欲求最后之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唯有全国人民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以赴之……，兹又开始劝募救国公债，我政府甚望侨胞能踊跃认购，余又不得不同样有相当之表示，以为倡率，故亦认购 10 万元。即此区区之款，尚须靠贷半数，始能足额，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唯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说过：“发了财的人，而肯全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先生。”此话绝无虚言。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38 年 5 月厦门沦陷后，鼓浪屿“国际救济会”、

“福州救济会”纷纷去电南洋，请求筹款救济。李清泉、庄西言再一次建议陈嘉庚组织统一的领导机构。庄西言又写信给行政院长孔祥熙，极言成立南洋华侨统一领导机构的重要性，并建议由陈嘉庚先生出面领导。孔祥熙于1938年7月30日来电，询问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统一机构有无必要，如何组织，当地环境是否允许等，陈嘉庚回电说：“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邀励督促。”不久，新加坡总领馆转来孔祥熙院长给陈嘉庚的复电：“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这是来自祖国中央政府的电令，陈嘉庚欣然接受，在取得当地殖民政府许可后，立即登报通告并另行书面通知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州，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处各筹赈会、慈善会、商会，订于10月10日国庆日，派代表来新加坡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限定大埠12名，中埠8名，小埠6名，旅费自备，并预告会议主要议题为：一、总会名称。二、地址。三、举主席及职员。四、各埠会承认常月捐义款每月若干。五、各埠代表提案须于开会前七天交筹备处。经过紧张的准备，大会在10月10日借用新加坡南

洋华侨中学礼堂举行。会议历时四天半，气氛热烈，群情激昂。代表们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统一领导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最高机构。陈嘉庚在会上致辞，他说，“唯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1万万元，每月合700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2000万元，合计每月可2000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争费每日250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总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当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大会选出陈嘉庚、李清泉、庄西言、侯西反、李铁民等16名南侨总会常务委员，选举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总会办事处设在新加坡武吉巴梭43号，各地筹赈会确认每月捐款共国币400多万元。

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华侨素有‘革命之母’之令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南洋方面，占十之八，此在道德的义务上，可谓已尽，而在国民天职上，究有未完，盖国

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大会明确提出抗日救国的三大任务：（一）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二）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以维持难民生计；（三）积极劝募公债及推销国货。会议发表的公告重申“焦土抗战”、“全民抗战”、“长期抗战”三个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共同奋斗的目标。

南侨总会是规模最大，地域最广，统领人数最多，工作最有效的跨国跨地区的华侨抗日救国联合组织。参加南侨总会的南洋各筹赈会有 68 处，派代表参加的有 45 埠，共 168 人。其中香港和暹罗的代表最少。因为香港粤侨没有组织，因而未派代表，只有二位闽侨代表参加。暹罗当时的执政者是亲日派，严禁华侨捐款汇往中国，严禁反日宣传，故暹罗首府曼谷无法派人参加，但来函表示拥护大会的一切议案，愿意参加南侨总会为会员。陈嘉庚先生称这次大会为“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

南侨总会对抗日最大的贡献是财力。为了筹集抗日所需经费，南洋各地 68 处筹赈会及下属 1000 多分

会、支会采用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筹款形式。如：常月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戏球赛捐、迎神拜香劝捐、公共场所设救济箱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南侨总会要求各筹赈会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援国救难宣传活动，多设分支机构，常月捐要有进而无退。

为了最大限度地筹集抗日资金，各地筹赈会吸收了华侨社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力量，包括华侨帮派、各行业、各团体。领导成员包括各地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基层群众代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劳工小贩亦倾尽血汗”，各地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例，特别是劳工阶层、贫苦侨胞。印尼华侨马细旦，因多年腿残，只能乞钱度日。抗战爆发后常恨自己不能回国抗日，便爬到市中心向侨胞陈述祖国难民惨状，请求市民捐钱援助，仅两日即募得荷币 40 盾，全部交当地慈善会，汇回祖国。又如卖子助赈的马来亚山打根小贩郑潮炯，他曾积极参加义卖活动支援抗日。1940 年听到父亲在家乡广东新会被日寇炸死的消息，悲愤至极，工作更加积极，但由于经济困难，捐不出钱，就将第四个孩子卖给别人，得叻币 80 元，全部缴给筹赈会。以后又游走 15 个埠，沿途劝捐，筹得叻币 2800 元，也全部交筹赈会汇回祖国。在亲日派执政的暹罗，关在监狱的华侨囚犯也心系祖国，秘密向狱中难友募捐，得国币 23.36 元，由出狱难友带出转交祖国。缅甸女侨胞叶秋莲，将自己所

有首饰和家产全部拍卖，得款 3 万多元，尽数捐给祖国用于抗日，自己因无处存身而出家为尼。这些感人的事例充分体现了南洋华侨爱国爱乡，为支持国内抗日千方百计无私奉献的精神，闪现出南洋 800 万华侨民族感情的光辉，为炎黄子孙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南洋各国是华侨居留最为集中的地区，占世界华侨的半数以上。南侨总会作为抗战时期 800 万南洋华侨的统一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身为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功不可没。仅 1938 年、1939 年两年时间，南侨总会的捐款就达 1.45 亿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 70%。1939 年国民政府的军费支出是 18 亿元，而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就达 11 亿元，其中 1 亿为捐款。陈嘉庚先生说过，按照世界银行的惯例，有 1 元外汇基金，可发纸币 4 元，这 11 亿外汇即可发行 44 亿元纸币，除发还侨眷养家费用 10 亿元外，还可有 34 亿作为国家军政费用。以此推算，南侨总会募集的款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就不言而喻了。南侨总会工作成效之惊人，南洋 800 万华侨爱国热情之高涨、民族感情之强烈，都为全世界所瞩目。

随着抗日战争规模的扩大，药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重庆国民政府致函南侨总会，要求供给大宗药品，如阿斯匹林片、金鸡纳霜、仁丹及救伤绷带等。南侨总会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满足国内药品供应的任务。绷带

由香港办理,金鸡纳霜由出产地印尼办理,总会发函后三个月,下属的印尼慈善组织就报告总会金鸡纳霜已经如数募足,寄经仰光,交西南运输处转交国民政府。阿斯匹林片如向药房购买价格很贵,若买来药粉自制成片,则可便宜一大半价钱,仁丹也是如此,而且原料可就近解决。所以陈嘉庚倡议由南侨总会在新加坡设一个制药厂,马来亚各区筹赈会极表赞成,1939年12月27日,总会邀请医学博士、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及殷学村等医药界名流开会商谈此事,陈嘉庚先生亲自出席,商谈结果决定组织南侨总会医药委员会并推举了各部负责人。与会者一致同意设立自己的制药厂,今后国内所需药品能自制的自制,不能自制的才向国外购买,尽量节约经费,多向国内供应药品。会后各部即分头积极筹备,租下了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隔壁的一处房产作为厂址。抓紧进行修葺、购置机器设备,但药厂尚未开工,而欧洲战事爆发,英国对德宣战,英属马来亚严禁各种物资出口,制药厂遂无法开工投产。因此陈嘉庚打算把已经购置的机器运回国内,另设药厂。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侨慰问团回国时,在重庆停留40天,在此期间,他考察了多家制药厂,因为设一个新药厂是很费时间的,而且烦杂事务很多,他想就便选一家合适的药厂进行投资,扩大生产,以便尽快满足药品的需要。后来他选定了由中国交通银行等几家金